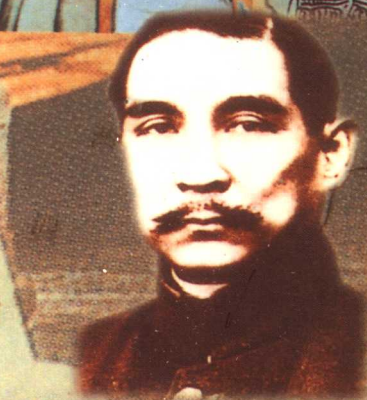


閩臺近代風雲

范啓龍 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閩臺近代風雲

范啓龍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閩臺近代風雲

范啓龍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出版發行

(香港屯門井財街7號2字E室)

*

(简体字本)

著作人 范啓龍

地址: 福建福州下藤路欣元麗景 3-403

電話: (0591) 83465683

開本: 大 32 開

印張: 14.5 字數: 41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962-8488-81-3

ISBN 978-962-8488-81-0

定價: 港幣 42 元 人民幣 42 元

王 序

范启龙教授的论文集将在台湾出版，他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要我写几句话。我近几年身体不好，现在美国休养，但我得知这件事后，非常高兴，写点感想，义不容辞。

我认识范兄已多年了，我记得他与我同庚，他是邵循正先生的高足，邵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在世时对我指导、关照很多，因而我与范兄之间除了同行以外，无形中似乎又有同门的友谊。1979年在南京举办了首次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讨论会，他参加了会议，提供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太平天国南方余部在闽粤的战斗》。终十年后，在广东茂名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他又提交了一篇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论文，很富新意。这是两次我们同参加的学术会议。可能不止这些，单凭回忆，有的已记不真切了。总之，自1979年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工作来往，使我进一步了解范兄的确是勤恳朴实，学养深厚的学者。

从他寄给我的论文集目录来看，我们一起参加过讨论的上述两篇，已编入了，编入的还有关于辛亥革命，关于华侨、关于台湾、关于福建地方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严复、陈宝琛等各方面专题的论文，大体上以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研究为主，又在在与地方史密切相连。范兄以福建人在福建高等学校执教数十年，所研究者自鸦片战争至民国，但根基不离福建，可谓研究历史，不忘乡梓，对中国近代史，对福建地方史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范兄告诉我，40多年来他已发表近百篇文章，选入论文集的自然只能是少数，而且都是1979年以后的作品，这反映了范兄和我这样年龄的人所经历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是学校里和社会上普遍学习、关注的课程。但从学术研究来看，似乎并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我在大学不是学历史的，工作后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而成为爱好者，业余研究者，后来才成为历史专业人员。我的体会是，那时对客观研究的认识很差，似乎只须重复‘真理’使之适应现实需要就行。这导致了‘文革’时期歪曲历史的种种荒谬议论，而真正的科学研究被排斥了，被扼杀了。1978年时，近代史研究所曾调查统计1949-1978年间国内国外对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和书籍，我记得，以国内而论，真是少而薄弱。在‘文革’结束以后，在那以后，我们大家对过去的时期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如何作科学研究渐渐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北京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朋友在1978年组成了一个名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的学术团体，这是当时最早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对于认真的历史研究起了一些促进作用。它发起、组织上述太平天国史的国际讨论会，范兄关于南方太平军的战斗一文，在“文革”时代的浮跨学风之后，带来了比较切实的气氛，它的扩充篇后来又发表在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主办的《太平天国学刊》上，受到当时与会者和读者的好评。我理解，这二十年，是中国历史研究者走上新道路的开始。现在，范兄将他的主要成果作一结集，反映出他二十年来的成就，我为他祝贺，并希望未来会促使学术和出版更加繁荣。

王庆成

1999年12月15日

张 序

得悉范启龙教授的《近代史论集》付梓，深感欣慰。

时光流逝，启龙兄和我相识业已 40 余年。50 年代后期，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师从我的导师邵循正先生，所以谊属同窗。他较我大几岁，自是学长。1958 年毕业后，我分配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粤闽毗邻，交往却并不多。好在我们同治中国近代史，在学术研究会上得以晤面，此外，就是阅读彼此发表的论文。在长期的接触中，启龙兄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谦虚慎重，治学严谨，工作认真，朴实无华。他那种力避浮燥、“不求闻达”的品格，令我钦敬。因为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毕生献身于高教事业，40 余年培育了无数人才；同时，在繁重的教学活动之余撰写了近百篇论著。他的生活是清苦的——正如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启龙兄的研究工作涉猎颇广，几乎涵盖了近代史领域中的大部分重要事件，其中，又侧重于政治史和文化史。显然，这与他的教学业务有关。他的许多文章均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发生在他的故乡福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备受关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则是他论著中的主课题，而作者的视角往往仍置于桑梓。

文如其人。启龙兄著述的优长是鲜明的。他非常重视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认真审查，充分利用可靠的、典型的史料，因为他完全懂得史说基础，使他的论述具备了科学性的前提。当然，立论中肯，言之成理，不仅必须持之有故，更需要正确理论、方法论的指导。

归根结蒂，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疏理，还应当作出分析、判断和评价，以揭示不同领域和层次的规律。从而，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因之，启龙兄颇为重视正确理论、方法论的引导。他的著述贯串着实事求是的准则，体现了利于反映历史真实的多元方法论。朴实明晓，不乏创见，这是我对启龙兄的著述的基本观感。他对中国近代史、福建地方史的研究卓有成绩，功不可没。

启龙兄长我数岁，年逾古稀。我祝愿他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成果丰硕。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有这样一种共识——怀有崇高的理想，锲而不舍地劳作，肩负着时代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就不会感到“老之将至”。生命的真谛，无疑在于奉献！

让我们共勉吧！

张 磊

2000年春于广州

汪 序

范启龙教授的《闽台近代风云》即将付梓印行，实在可喜可贺。范先生是我系前辈，长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治史四十余年，尤擅长中国近代史和福建地方史的研究，学殖深厚，著述颇丰。他为人谦虚朴实，为学严谨勤恳，为人们所称道。此番嘱我作序，作为学生辈，深感难承此任，然既蒙先生抬爱，又恐却之不恭，只有勉为其难了。

《闽台近代风云》是范先生逾四十年研究成果的精选。该书很好地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既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了宏观上的探讨，又对近代的福建作了具体的分析，凸显出福建历史的特色。其中《太平军四次入闽战斗及福建人民的反清斗争》一文被史学界公认为“填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空白”。在材料的搜集与辨析上则更见范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他在对前人研究成果了然于胸的基础上，大量地搜集历史文献资料并进行精审细密的考证，故新见迭出。

阅读全书，犹如暮春乘舟游山阴道，精彩风景目不暇接。此书的出版，定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闽台近代历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是为序。

汪征鲁 拜识

2005年10月于福州

用稿通知单

范启龙 同志:

由您撰写的“

闽台文化历史渊源浅探

”一文,已经正式入编由

(国家一级出版社)西苑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发展论丛》一书中,特此

通知。

北京求实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二〇〇四年 月 日

著作证书



范启龙 同志:

您撰写的 闽台文化历史渊源浅探

一文,现已经入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 西苑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发展论丛》,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

定,您依法享有该文的著作权。

姓名 范启龙 性别 男

单位 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

职务 教师 职称 教授

证书编号 NO. 090005



《闽台近代风云》

王序	(1)
张序	(3)
汪序	(5)

目 录

《南京条约》对福建的影响	(1)
鸦片战争后的福州	(9)
太平军四次入闽战斗及福建人民的反清斗争	(17)
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实施中国近代化	(80)
“清流派”陈宝琛与中法战争	(89)
中法战争期间福建军民的反侵略斗争	(100)
试论“台湾民主国”和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抗日斗争	(106)
19 世纪中叶以后列强对闽台地区的侵略活动	(116)
福建辛亥风云	(130)
辛亥革命前后的福建	(148)
辛亥革命与福建华侨	(198)
清末海军与辛亥革命 ——兼论萨镇冰对革命的态度	(210)
港澳台与辛亥革命	(221)
辛亥革命时期台湾人民要求回归祖国的抗日斗争	(231)
辛亥革命在汀江流域	(247)

洗雪百年国耻 迎接香港回归	(256)
洗尽殖民历史 欢庆澳门回归	(266)
闽台文化历史渊源浅探	(287)
略论林则徐爱国思想的特点	(296)
严复一生心系祖国前途	(302)
严复祖孙三代忠诚的爱国情怀	(313)
戊戌变法时期的严复	(328)
学贯中西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338)
《天演论》的译著及其伟大影响	(344)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光辉的一生	
——为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 100 周年而作	(351)
瞻仰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384)
林觉民	(388)
方声洞	(393)
方君瑛	(397)
南下护法国会议员雷焕猷	(400)
陈宝琛史事四则	(403)
陈宝琛在福建	(409)
近代闽籍文学家、教育家江瀚	(414)
中国近代司法界泰斗江庸	(416)
陈兆鏊	(422)
关于五口开埠通商的日期	(425)
萧文遗稿《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军在长汀的失败》一文 中有关福建史实的问题	(430)
后记	(451)

《南京条约》对福建的影响*

1840年，英国作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头号殖民王国，以拥有坚船利炮的优势，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朝廷 1842 年 8 月 29 日在炮口的逼迫下，签订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又称《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¹⁾这就是历史上关于“五口通商”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通商的五口集中在东南沿海四省之内，而福建省却占了福、厦二口。福建社会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一) 洋布洋棉排挤土布土棉

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的轻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强盗“用武力夺得了五大商港中的自由贸易权，千百只英国和美国的轮船开到了中国去，而在很快的时期内，中国市场上就被充满了英国和美国的便宜的机器制造品。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竞争不过机器工业。于是稳固的中国就遇到了社会危机。”⁽²⁾首当其冲的五口及其附近地区，便出现了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现象。英美商人大量输入机器制造的洋纱洋布，来打击和排挤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福州是 1844 年 11 月开埠通商的，初期外轮进口不多，“1845 年有 765 吨的航运进口，贸易价值是 375000

* 本文原刊于《孙中山与福建》书中第一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出版

元，”⁽³⁾大多数是由本国商船运输进来的。据当时在福州做过调查的英国人估计，每年由中国商船运进的外国货价值为 745.5 万银元；在福州“几乎在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穿着我们的纺织品，在城里走一走就可看到，大多数布店都在零售英国布和一些美国布。”⁽⁴⁾1847 年 1 月 18 日，驻福州的英国领事若逊说，每年有 200 万匹以上的外国棉布在福州销售。⁽⁵⁾据同年 11 月《澳门日报》记载：“本地商人在福州出售的外国布匹，为数甚多。他们的许多商号，特别是城内的，规模都很大，备有大量货品，俄国布匹的售量也很大。”⁽⁶⁾

据《英国蓝皮书》所载，1845 年外轮运进厦门货物的总值是 195323 镑，1846 年则为 246366 镑，1847 年增至 255734 镑。1847 年厦门仅进口外国呢绒和棉布，就达到 87771 匹，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走私的部分。而本国商船也参与运载外国商品。因此，实际的进口数额要比上述数字大得多。⁽⁷⁾厦门本是福建省手工棉织品的主要集散中心，“向来在厦商人，将本省漳州府属及同安县土产之棉布等物，由海道运至宁波、乍浦、上海、天津、盖平及台湾鹿港一带销售，复在宁波等处贩卖江浙之棉布及各种货物至厦门售卖，其各省商船之来厦者亦如此辗转行运”。⁽⁸⁾厦门自 1843 年 11 月 2 日开市以后，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内，上述情况就起了明显的变化。洋布、洋棉“充积于厦门”，“其质既美，其价复廉”，土布、土棉直接遭到严重的打击，“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⁹⁾于是“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虽然这种情况还只是开始在福、厦二口及其附近地区出现，它却是根深蒂固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即将解体的征兆。

(二) 鸦片输入剧增

战后不仅西洋机器制品大量进口，鸦片输入的数量也比战前直线上升。战前港、澳和广州零丁一带海面早已有鸦片趸船。战后自香港、澳门、汕头、泉州、福州、厦门、定海直到吴淞口等已开未开口岸，几乎到处都设有趸船。有的趸船除设置外商经理人员外，还配备了一套买办、通事、看银师等华人雇员，并保留着必要的周

转资金。⁽¹⁰⁾可见这种趸船实际上已经是沿海各口鸦片走私贸易的中心和据点。

在福建沿海，不仅停泊在福、厦两地口岸外，在集美和泉州外海也各停有二艘。⁽¹¹⁾据《澳门月报》所载，战后每年有价值200万银元的鸦片输入福州，“福州城内每日零售约四至八箱”，“福州城内共有烟馆百余家”，“福州居民一半以上染上了鸦片嗜好”，毒贩还从福州将大量鸦片运入内地⁽¹²⁾。当年福州英国领事若逊向英国政府报告说，福州每年销售的鸦片达1400箱或1500箱⁽¹³⁾。停泊在闽江口外的“阿尼达号”、“威克森号”两艘外国鸦片趸船船主，还公然在福州南台开设了鸦片商行⁽¹⁴⁾。鸦片的泛滥给福建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1850年林则徐回福建以后深有感慨地说，鸦片已使“家乡江河日下，人人穷不聊生”⁽¹⁵⁾。

(三) 走私猖狂

外国侵略者不但疯狂地进行大量鸦片走私活动，而且还在福建沿海从事商品的走私贩卖，偷税漏税。1849年厦门英国领事雷顿在致英驻华公使方翰的信中说：“走私的数量现在已经大大增加，走私贸易，特别是由外国船只所进行的走私贸易，去年非常活跃……自1846年以来，走私贸易额已经增加了两三倍。我毫不犹豫地相信，1848年的走私贸易额决不少于八万镑，并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¹⁶⁾1854年4月，先后担任过厦门、福州、上海三个口岸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向英政府报告称：“我十年来在三个口岸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承认……关于忠实征收中国皇帝在对外贸易上应得的一切海关税饷的事情，条约已无异于废纸。……外国人随时准备玩忽法令，以武力抵抗中国官员的干涉。……由于政治理由，他们（中国官员）对海外强权和外国人民尤其不敢有任何公开的冲突或敌对行动。”⁽¹⁷⁾福州英领事若逊承认，输入福州的外国货“大都是在海关人员的纵容之下走私来的”⁽¹⁸⁾。外国走私贩子受着他们领事的保护，同时又采用贿赂和收买的手段，勾结中国地方官员和海关工作人员，做到一方面领事“佯作不知”，另一方面则中国官府“明知故纵”，通过这种里应外合的巧妙配合，使走私偷税漏税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

他们走私偷运的项目，从洋纱洋布到各种土产都有，甚至还包括封建统治者一向专利的盐斤和违禁品军火，而其中规模最大的还是鸦片。当时偷运鸦片是在华洋行商人最赚钱的一项“生意”。据说一个“船长”从印度贩运鸦片来华，一趟就可获利 3000 元。⁽¹⁹⁾在贩毒活动中，领事扮演着非常卑鄙的角色，他们甚至是毒贩的同谋者或合伙人。一边由领事通过政治特权向鸦片贩子提供各种方便，一边则由鸦片贩子向领事支付活动的经费，双方紧密地勾搭在一起。接着，外国侵略者又把走私活动扩大到尚未对外开放的福建沿海各地，英国公使馆秘书切尼在考察报告中说，“1856 年到达淡水的外商船只凡 45 艘，载去货物达一万吨”⁽²⁰⁾，便是明证。不仅如此，1853 年英国驻厦领事在闽南小刀会占领厦门期间，竟乘机“解除了英国商人们对贸易纳税的条约义务”⁽²¹⁾，公然带头违抗条约规定的应尽纳税义务。

(四) 银贵钱贱比战前更甚

战后的福建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旧的封建剥削不断加重，又加上新的外国侵略者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和鸦片走私的疯狂盘剥，使得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现象比战前尤为严重。长乐人谢章铤便曾记录当时福州的情况，他说：“向时福州银一两，约值钱一贯二三百，今乃渐增至二贯矣。向时福州纳租税赋银一两者，纳完钱一贯七八百，官吏浮收五六百以为火耗。今须赔垫二百，仅敷一两元数，而解费尚无所出。一处如是，他处略同。”⁽²²⁾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便指出“银价之昂日甚一日，其故由于银少，实不在于钱多”⁽²³⁾。到了 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情况更糟，1855 年泉州府属“银价每两贵至三千余文”⁽²⁴⁾，人民的负担就更重了。

(五) 外人干预政治

来华的外国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仅不择手段地。从事经济掠夺，而且开始干预福建的地方政治。英国强盗在闽粤交界的南澳岛上非法“起盖夷馆夷楼，并设教场，在彼日行操演。往

来船只以此为巢穴，时出肆虐居民妇女，擅受民间词讼。又在厦门鼓浪屿干预地方民事”。他们焚毁民房，勒索民财，甚至参与械斗，屠杀福建人民。1842年，“龙溪县黄、吴村庄被水灾，拾获漂流杉木、竹筏，其后赴夷告诉，该夷即到吴姓焚毁房屋至十三所之多，而黄姓需夷洋银六百元得免。现在附近各乡村械斗者，皆需银嘱其帮斗，该夷即为出力残毁，百姓糜烂实甚”⁽²⁵⁾。他们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还在福、厦二口强行租占土地。⁽²⁶⁾1858年，侵略者又杀害福州领航人员，强制把持了闽江口外的引水业务⁽²⁷⁾。

(六) 拐骗贩卖华工

英美法等国侵略者还利用福建人民生活无着的机会，采用惨无人道的拐骗、绑架等各种野蛮手段将华工运往海外贩卖。厦门开埠以后，外商跟着就创设商行，其中德记行、合记行等，都是以拐骗华工的人口贩子而著名⁽²⁸⁾。厦门在1847年3月7日有英国船第一次载运华工400多名前往美洲。从此以后，“厦门主要的出口经常是劳工”⁽²⁹⁾。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布兰特雷的报告，1847年起至1853年3月止，由厦门一口运往海外贩卖的中国人共有12151人⁽³⁰⁾。厦门人民对拐骗华工的罪恶行为深恶痛绝，曾用“厦门士商”的名义，贴出告白，揭露真相，提醒国人注意。其文曰：“为惯匪诱骗、图陷民命、告晓预防事：慨自夷人通商厦岛以来，买人贩卖，罗虐无辜，勾引内地奸匪，拐骗良民，名曰客头。朋谋数十人，串通数百人，狼贪虎视，垄断而登，逐日在沿海内山，四处招摇撞骗，利己损人。始则以微利媒引孤独穷民，继则以饵术拐带人家子弟，甚至奸计百出，操术弥工。或借以佣工取利，驱之陷阱；或导以析单便宜，坠诸术中；或诱以散步玩游，罩陷良善。种种弊端，村里愚民，屡被一网打尽。似此利欲熏心，天良笃丧，人被拐到夷行甲板，公然指卖。一人其中，鸩舌难通，酷甚囹圄，呼天泣地，任诉莫何。迨至载至番邦，日夜疲劳，不遑假寐，进退无门，毙而后已。而且音信不通，生死未卜，致父母家人肝肠碎裂，卒至覆宗绝嗣，害伊胡底。嗟乎！生为中华之人，死为异域之鬼，彼苍者天，奈何歼我良人乎！？所愿仁人君子，群相训勉，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思患预防，

毋致误中奸徒之计；告诫叮咛，启人万死一生之路。敢竭愚诚，沥陈数语，凡百君子，信而听之。厦门士商同白。”⁽³¹⁾

受拐骗的华工一旦落入人口贩子的魔掌，就要遭受双重盘剥，洋行把华工当做奴隶买卖，盈得利润以后，资本家还要在华工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为了偿付运输费用及“身价”，资本家对华工的剥削也必然加倍残酷，受拐骗者在失去自由的同时，还失去了生命的保障。有个侵略分子这样写道，当华工被骗至“收容所”后，即被剥去衣服，在胸部打上字样号码，编号之后，有些被直接装船外运，有些则先特制牢笼，囚禁待运⁽³²⁾。在外运以前，“审问及清点人数时，从者得免虐待，不从者则惨遭毒刑，甚至枪杀”；及至“送往国外，卖为奴隶，受尽磨难，其能存者，万不得一”⁽³³⁾。至于运输途中海上地狱的悲惨遭遇，尤令人发指。他们为了多装多运，一般船只竟把华工所占舱位每位压至8平方英尺，这意味着既难于转侧，双腿也不能直伸，加上其他恶劣条件，以至一艘载运298人的苦力船在前往古巴的航程之中，有135人丧生，死亡率竟高达45%。⁽³⁴⁾外国侵略者称拐卖华工的活动为“卖猪仔”，受拐被拐者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他们像囚犯一样，被迫在异国他乡为外国资本家做牛马苦工，过着惨无人道的日子。他们根本无法同家人联系，不少人最终埋骨异域。有的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只得中途铤而走险，进行集体暴动，以求死里逃生，但往往以失败告终。偶而有取得胜利逃回家乡者，仍然被外人勾结官府进行反攻倒算，进行残酷的报复和迫害。英国侵略者甚至公开出动武装队伍，保护掠卖华工的骗子，开枪镇压中国人民。如1852年11月24日，英国军舰“萨拉门多”号便公然派兵在厦门登陆，向要求英商德记、合记人贩洋行交出拐卖华工的骗子的群众1500多人开枪射击，被当场杀害8人，重伤16人。⁽³⁵⁾

（七）名为“护航”实为强盗

同走私贩毒、拐卖华工一样，英国海盗商人还利用“护航”勾当来肆虐中国船民。“护航”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最典型的海盗行径，也是他们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最露骨的暴力掠夺。一个海盗商人只消以三四百元买一条小船武装起来，便可悬挂洋旗进行“护航”，收取“护航费”。⁽³⁶⁾曾经有一只140吨的双桅小帆船“厦门”号，自宁